

9-1-2011

中国发展模式: 国际发展与霸权

乔纳森 H. 平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eassc_publication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平, 乔纳森 H., "中国发展模式: 国际发展与霸权" (2011). *EASSC Publications*. Paper 23.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eassc_publications/23

This Book Chapter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ast Asia Security Centre at [ePublications@bond](mailto:epublications@bond).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EASSC Public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ePublications@bond](mailto:epublications@bon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Bond University's Repository Coordinator](#).

第六章 中国发展模式： 国际发展与霸权

乔纳森·H·平
邦德大学

引言

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本章运用政治经济学，从历史角度来解读当代的国家市场关系，并提出这样一个论题：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更积极的承担责任，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相互依存以及重商主义安全观的窘境，使地区性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鉴于这些情况，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另外我们还应该了解，由于其自身的相对大小，中国的发展将对所有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因此，这些国家面临的选择是，把中国看作盟友还是对自身发展的威胁。当然，中国不必被动接受选择，而是可以战略性的影响这些决策的制定。

因此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显然，作为最大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法提供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政治和公共利益——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做法，注重自身的发展。然而，使地区问题产生全球影响的结构力量¹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国家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大国身份相应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与中国目前的人均统计数据是不相应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负担，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范例和机遇。

同时，这个模式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的路途上不断前进。但中国的成功发展不应作为全球发展的模版；对其他同样追求发展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应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挥催化剂作用。²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大国并不是注定的，也不是永无止境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最高点。随着国内市场的成熟（造成劳动力价格上升，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市场对全球资源的需求也随之攀升；因此，为了摆脱仅作为世界工厂³的局限，中国不得不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展示霸权。然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一个勉强的霸权，也不是一个受到遏制的霸权，而是一个力不从心的霸权。中国如果要避免倒退，就必须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更直接的说，中国要想索取，就必须先给予。中国只有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温和的霸权，才能促进和实现其国内发展目标。

本章第一部分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背景，并指出地区和全球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在这个背景下讨论所有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市场关系；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下的国家和市场；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等级结构；宏观变化等。本章第二部分分析国际发展，以及中国作为温和霸权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的机会。

第一部分：背景

什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什么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属于国际关系(IR)领域的分支学科。从早期的亚当·斯密(1723-1790)、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大卫·里卡多(1772-1823)以及卡尔·马克思(1818-1883)

时期政治经济学开始，该学科如凤凰涅槃一般再次兴起。18 世纪末由英国中部地区开始的工业革命是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之一。当时，亚当·斯密提出了激进自由主义的概念，对重商主义发起挑战。卡尔·马克思超越了世俗的政治经济结构，批判性的提出了分配和所有权不均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随后的批判理论家开始考虑性别、环境稳定和意义建构⁴等方面。政治经济学自此开始研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苏珊·斯特兰奇、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吉尔平和罗伯特·考克斯等先驱学者注意到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开始相互交织。因此他们认识到，研究国家财富实际上就是认识并驾驭不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这一进程能够突破主权国家的局限和国内市场的限制，从而提升国内的潜力。⁵到了 20 世纪末，冷战已经结束，反恐战争还未开始，众多西方学者宣称：决定政治经济活动意义和目的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但世界上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中。⁶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兴起于欧洲的工业革命继续向世界其他国家传播。从 21 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前英国殖民地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或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增速相当。⁷在研究目前的工业革命时，过分强调地区或单一国家的作用，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不正确的。从（同时也在）西方世界来说，发展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完成了。在亚洲，有人把这场延续工业革命称为“亚洲奇迹”——这是二十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然而学术上的探寻和对话只是辩证性的。1994 年，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亚洲奇迹不过是当前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 5%到 12%的高增

速仅能反映出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和企业）投入的增加——结果是出现了新的产业、技术和知识。⁸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证实了亚洲奇迹仅是工业革命一部分。这种典型的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模式突然间变得十分明显。但是当时的学者很快发现，这种极具洞察力的观点并没有使人们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保持平静或是能更轻松的分析这场危机，将这种观点纳入学科理论和政策也并不那么容易。

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反映的是那些收集数据并提出理论的学者的观点。在学术界以外，这种研究只在针对具体事件和满足社会需求时才能起到作用。国家的财富（或发展）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对中国的工业革命进行研究与解读，只是延续了由政治经济学为展开的研究。这种研究和解读对于理解国家怎样获得财富或实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由此形成的发展国家和发展模式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⁹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联合国发展署的图表显示，尽管中国人口在增加，但中国人均财富提高了5倍，人均寿命也有所上升。¹⁰综合性更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也同样展示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功。包括GDP实际增长率等其他大量数据反映了令人感到鼓舞的持续增长。¹¹

图 6.1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以 2006 年的价值为基准）1980-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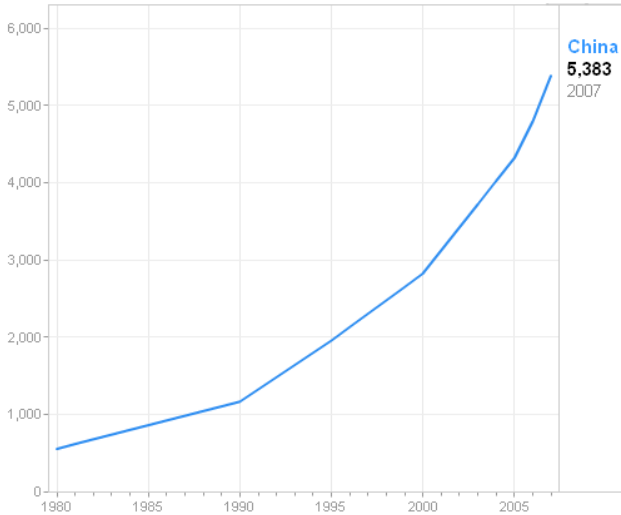


图 6.2 人类发展指数 1980-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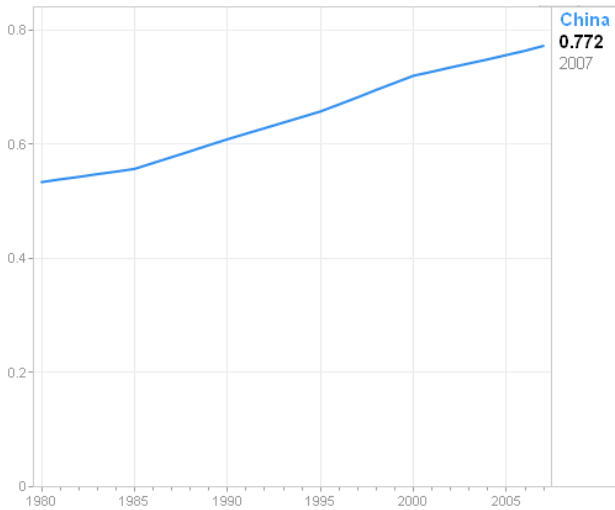


图 6.3 出生时预期寿命，1980–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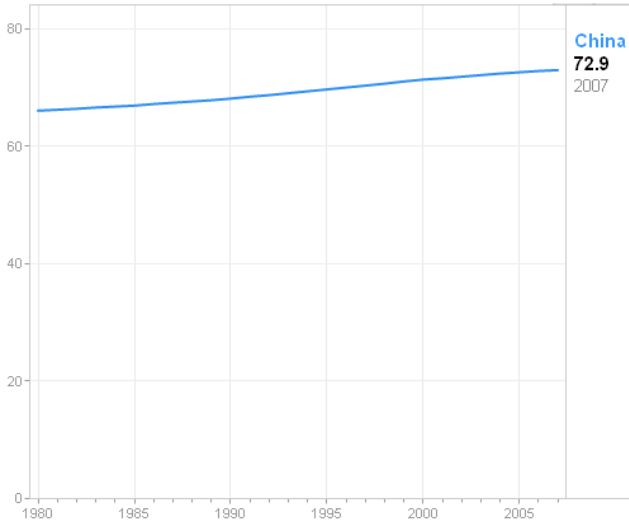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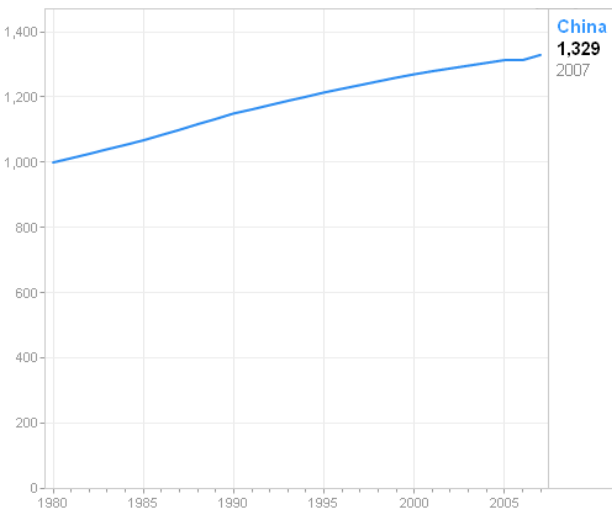


图 6.4 人口（百万）1980–2007



在 21 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用各种方法帮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关于国家市场的辩论、对行为体和/或系统治理的研究必须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即应该促进全球的发展。¹²就其本身而论,中国发展的成功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家与市场

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市场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传统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需要控制市场,而市场反对国家的控制¹³。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运用治国方略构建国家主权,反对内部外部各种对国家存在的威胁——包括不受监管的市场造成的威胁。其目的是运用治国方略(重新)创建国家,而最终纯理论上的目标则是在其领土上建立一个拥有最高合法权威的主权国家。¹⁴相反,市场要摆脱限制追求自由,尤其要摆脱国家监管和干预。拥有完美竞争力的市场只是理论上的目标,这种市场可以进行最高效的生产和交换。以上都是正确的观点,但它们之间并不一定会产生冲突。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一般性假设,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冲突。

重商主义关注国家,自由主义关注市场,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然强调的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冲突。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全球化的作用和替代行为体形式的广泛争论。其中一种重要观点认为:全球化导致市场自由化,这给国家提出了一个难题。另一种合理的观点认为:国家将被取代或灭亡。在 20 世纪下半叶,全球化开始兴起,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三个新的行为体,它们拥有与国家同样强大的力

量，即政府间组织(IGO)、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公司(MNC)。

国家市场对立理论、全球化和新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间组织、多边组织和/或地区政治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或欧盟(EU)等，限制了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利用信息革命形成了国际倡议网络，决定民事、人类环境和/或其他的标准和规范，而不必服从国家的主权权利。货物和服务被外包给更高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于是，一种全球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文化开始成形——这对自由主义、市场、公司和个人来说都是胜利。

但国家市场相对立理论被过分强调了，这产生了误导作用。欧洲政治经济体系的创立和后来的欧洲奇迹，展示了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妥协、合作共生的历史，也清楚的证明了“或赢或输”“非此即彼”的理论是不正确的。¹⁵欧洲的政治经济领域从1500年开始合作：国家提供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的环境，市场进行高效的生产并提供税收。欧洲政治经济这种卓越的妥协合作使其击败了其他形式的合作；并在20世纪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

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与市场之间这种共生关系，对重商主义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也依然如此）。埃里克·R·伍尔夫对这个阶段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日本、亚洲四小龙或今天的中国：

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工业生产之前，首先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变化，使这种新秩序得以确定。国家从攫取人民资源的进贡结构转变为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前者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垄断，这削弱了资本的增值能力，因此必须废除。打破国

国家对生产资源的控制，打破第一种结构的掌权人员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能使国家更积极的资本积累的需求做出回应。同时，国家应投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这能使资本获益，并且支出也比较少。一方面，国家应颁布新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和私有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国家要运用干预手段，破除其内部阻碍资本、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最后，国家还应对新兴产业给予协助和补贴，保护其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或者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国外市场。¹⁶

在亚洲，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模式——一个强有力的、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并在全球市场经营。欧洲奇迹和亚洲奇迹两者的成功，都是因为持久的国家-市场共生关系和积极拓展外部市场，而不是只注意其中一个方面。中国要想成功，也必须采取相同的做法。

20 世纪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了自身基本因素和思想体系的局限，因此其错误观点也情有可原。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围绕马克思主义兴衰的现实冲突——即冷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对于学者来说，在 20 世纪冷战的背景下，想要找出社会主义国家指导的市场有哪些有利条件，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将产生威胁。但在 21 世纪，人们的兴趣从意识形态斗争转移到结果上，因此，忽略中国发展的成功是非常不理智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严谨的分析替代一般性假设。国家和市场都对资源和权力进行分配，二者都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发展模式突显了传统的、从意识形态上和环境中定义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因为这种发展模式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这清楚的显示出了一个善于发展的市场也需要一个发展的国家，情况一直如此。

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下的国家和市场

意识形态的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也画上了句号，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们可以专心研究发展成果。¹⁷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市场关系。20世纪后期，阻碍贸易的政治壁垒减少，成本更低的运输和通讯手段促进了全球市场的发展。因此，国家与其内部市场之间的共生也变为各国与共同的全球市场之间的共生。这种变化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结构上相互依存。¹⁸

由于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国家想要发展，其国内市场结构就必须适应全球市场。安东尼·佩恩运用考克斯的批判政治经济学¹⁹对发展做出如下定义：

由构成某一国家（或至少先是某一国家）的社会与政治行为体，共同构建合理、运转良好的政治经济体系（体系的核心内部特征和全球秩序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在体系内的人的福祉。²⁰

国家想要发展国内市场，就必须适应全球市场。只有和全球化的世界进行接触，才能创建发展需要的国家-市场关系。因此，21世纪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下的国家-市场关系，既带来了机遇，也产生了限制。持久的国家-市场政治经济体系可以促进发展，如同过去的欧洲那样，这是最重要的机遇。但是，融入全球体系的需要以及结构上的相互依存，从部分上决定了可供选择的政治经济类型，这是最大的限制。就其本身来说，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与全球性的世界秩

序逐渐接轨。相应的，世界秩序也必须适应中国的结构力量。

国家-市场共生关系必须得到维持。国家要创建市场，通过立法管理市场，并对市场进行调控。在全球市场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的维护。最初，国家和区域性组织通过国内政治和区域政治对全球市场进行维护；现在，市场维护更主要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政府间组织，以及类似 20 国集团(G20)这种更广泛的平台进行的，这种情况也将继续下去。

虽然所有国家都需要参与维护全球市场，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资源或能力这么做。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样的利益。国家越发达、越大，就应该为维护全球市场做出越多贡献，这是 21 世纪发展的基本准则。另外，鉴于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大国还应该做出额外贡献。因此，大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大国和中小规模国家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军事和经济实力；人口或地域的相对大小；GDP 增长率或经济构成；可用资源或贸易额；人口预期寿命或教育程度等。几个世纪以来，学者利用统计数字和已知权力来源为各国的潜在相对力量（即 A 使 B 屈服于 A 意愿的力量）排序。这里重要的是，潜在力量与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和能力是不同的。国家间的等级结构反映了各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潜在能力和使用结构权力的能力。这种等级结构分为大中小三级。²¹

这三种类型的国家，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维护全球市场方面，各自能力如何？大国有力量足以强迫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接受自己的意愿，也能阻止自身必须做出的改变。中等规模国家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或抵御改变，但是他们可以综合使用不同的力量，如综合利用新的己的权力来源和治国方略，通过国家再创造（即开发更有效的新政策）得以生存。他们把其他国家（通常是最大或最成功的国家—比如说现在的中国）成功的经验与自己的特点结合起来，创造出独特的治国方略和己知力量。小国没有能力施加或抵御变化。²²

在参与维护全球市场的问题上，我们对中国有哪些期望？中国是大国的首要原因是其人口数量。但中国的其他指标，如占全球贸易比重、GDP 规模、军费支出等，也在不断上升。中国还不是发达国家，但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使其迅速发展。世界上有人有预计中国会最终赶上或超过欧洲和美国的发展水平，成为发达的大国。因此，中国应该在维护全球市场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并做出更多贡献。中小

国家应该多参考中国的发展范例和良好的治理。那么这将如何实现？

什么是宏观变化？宏观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宏观变化指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结构力量和创造结构力量的变化。受宏观变化影响的人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变化一例，如从农业经济到重商主义经济再到工业经济的缓慢转化，通常是不为人所见的——但像战争这样的宏观变化却是十分剧烈的，甚至会对人类生存产生威胁。除了受影响者对这种变化的注意度之外，有意识变化和无意识变化之间的区别也同样重要。一般认为，推动变化的行为体包括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相关的争论中心一般是意识形态问题。但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宏观变化是由国家、其他行为体（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以及环境/背景造成的。

几百年来，大国都是规则的制定者；霸权国家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那么在宏观变化方面，这种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1939年，美国废除了美日之间的通商航海条约。1940年，美国对日本自美国进口的航空燃料和废金属实行部分禁运。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作为回应，日本于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美国随后对日本宣战。至此，美国相继动用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²³

日本当时奉行扩张主义，试图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作为回应，美国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日美两国都试图改变英国在19世纪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日本谋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动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自由的全球市场。随后美国继续按自己的设想推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上的宏观变化，并和另一个大国苏联进行对抗。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这场由决定国际

政治经济体系性质引发的冲突持续长达 50 年,美国成为了最终获胜者。以上这些事实说明,如果国家想要推动宏观变化,就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宏观变化的第二类行为体是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些行为体或由国家成立、或与国家力量合作,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力量也越来越强,现在也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推动宏观变化。例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政府间组织可以通过自由制度主义平息国家之间的现实冲突。²⁴玛格丽特·凯克对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有能力运用信息、责任、影响力政治和象征政治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²⁵

跨国公司指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的公司。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 21 世纪,跨国公司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竞争推动了全球市场的变化。有时这是一种有意而为的战略,另外,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可能无意识的造成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宏观变化。最近的例子就是 2008 年到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生产科技和知识的扩散、资源的分配、提供货物和服务,本地生产和经济多样化、本地竞争加剧、投资或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教育机会的增加、信息、标准和文化的传播、雇佣劳动力和支付国家税务等。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宏观变化的第三类因素是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或背景,如资源短缺、创新、认知基础或意料之外的冲击。资源短缺会对行为体产生限制。第五章指出,石油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政治或经济结构上的创新会导致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以及第一家跨国公司的出现,都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认知基础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基础知识和无意的

变化（见第二章）。最后，意料之外的冲击，如 9/11 恐怖袭击或 2004 年、2011 年的海啸，会改变行为体所处的环境或背景。

目前，由中国推动的全球宏观变化是中国国内政策、变化和发展的外部反应。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是无意识的，这一点很明确——中国只是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然而对于稀有资源价格的上升、全球 CO² 排放的增加、苏丹达尔富尔武装冲突、货币价值波动、澳大利亚免于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澳大利亚繁荣的资源业、这种繁荣对其制造业的作用，和其它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都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因素”。²⁶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还未有意识的参与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主要因为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中国不具备促成宏观变化的关系或能力，也不是一个有意识去创建和重新创建全球市场的发展国家。中国拥有国家-市场共生关系，而不是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所需的国家-全球市场关系。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国内政策的外延最终将触犯其他国家的利益。²⁷另外，中国在政府间组织的发挥的作用，与其大国地位或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期望也不相称。中国也没有通过非政府组织去宣传自己的标准和价值。中国的确拥有跨国公司，比如几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但这些公司仅仅开展石油业务，因为缺乏透明度而受到限制，其所有权交易也受到限制（见第五章）。中国要想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宏观变化，就必须建立起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通过其他行为体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国需要对环境/背景上的宏观变化做出积极回应，并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重要的是，中国要有使用力量的意愿和能力。

第二部分：分析

国际发展

国际发展是本世纪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和最大机遇。通过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到西方水平，该体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只有约 25% 的部分达到这一水平）。这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未能对全球需求做出有效回应，使用这些知识的主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另外，众多未得到充分解决的关键问题也说明，学者们未能在全球社会中发挥有效作用。通过研究中国这个发展国家，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世界上更多地区的发展；另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可能也会得到西方更多的关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更积极的接触将使国际发展从整体上受益。

这些综合性研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政府政策，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减缓全球人口增长；同样在西方国家，教育、妇女解放和摆脱生育实现自我的愿望也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恐怖主义是由贫困和缺乏自主决定权的造成的，同样也是因为各国纵容了失败国家的存在。²⁸ 资源富饶论者认为，科技可以实现环境和人口上的可持续——但这种科技知识一般只有发达国家才掌握。包括这些在内以及其他问题（食物生产、公平贸易、人权、住房、清洁水和卫生等）都可以通过各国共同促进国际发展得到改善。

通过研究哪些行为可以促进发展，可以进一步丰富之前安东尼·佩恩对发展的定义。佩恩的定义包括：“运转良好的政治经济……提高生活在体系内的人的福祉。”²⁹ 这说明，发展就是提供货物和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国

际发展也一样。国家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在全球层面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

政治利益起源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并通过税收筹集资金——这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共生关系。如果没有市场，国家就没有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的资金。安全是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其余按重要性降序排列依次为：法治和契约；医疗保健；教育（社会、学校、大学）；基础设施（道路、铁路、电力、水）；金融系统（货币、银行）；财政和制度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以及对共有物品的调控。

公共利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会因消耗而减少，消费者也不会因价格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获得公共利益。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公园、法治、免费全国性媒体服务、货币的使用以及水和空气等。在经济学中，这一定义又扩展到集体利益，即可由私营领域提供的公共利益。私有化和公私合作是互相对应的政策，允许跨国公司提供集体利益。因此，公共利益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给社会的。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公共利益(GPG)的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间组织对此尤其关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都在讨论这个概念，全球公共利益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包括健康、金融安全与市场效率、环境、人类安全与和平、信息与知识、水、空气和食物等。另外，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穆德·尤努斯教授提出，信贷也应该被认作是人们的权利。³⁰全球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没有得到充分实施，主要原因是其在金融方面的影响，这种利益由谁来提供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³¹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无法提供公共利益，因为它们不能从国家-市场共生关系中获得税收，去这些利益筹集资金。

政府间组织从国家获得资金，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政府间组织和捐款。跨国公司的义务是赚取利润。所以，国家是唯一可以提供公共利益的行为体。鉴于这个情况，大国有责任提供全球公共利益。这是由他们的全球范围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应就这样做。其结果是拟态全球公共利益。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因特网、安全的海洋航线、核保护伞、以及抵抗和遏制流氓国家。美国目前在全球范围提供这些服务，但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国家利益。在全球背景下，安全和（重新）建立的全球市场这两者，是美国提供的最重要的利益。那么中国能为全球提供哪些政治公共利益和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呢？

国际发展这个概念（通过提供政治公共利益和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实现）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我们把一些基本定义放在国际发展辩证法做中来看时，这些定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然之间，一个拥有核武器、具有威胁性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众多高质量政治公共利益的国家。美国就是这么一个例子：以传统标准衡量，她是一个超级大国，但从国际发展角度来看，大量的贫穷人口使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变得非常低。

这种概念上的变化源自罗伯特·罗特伯格的研究，他使用政治利益的概念对国家进行分级。³²按照各国提供政治利益的质量和范围，他将国家分为强国、弱国、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后来这些专有词汇又被全球安全研究借用。弱国、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稳定的因素的载体，如跨国安全威胁、人道主义灾难或全球恐怖主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有潜力成为一个国际发展超级大国。但是，只有获得其他行为体的帮助，中国才能推动宏观变化。

国家的发展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的”跨国公司能为中国推动宏观变化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全球约有 40 亿需要各种货物和服务的潜在客户——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 75% 的世界。而产品是现成的。看一下你所在的房间或空间，只有是你看到的而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的货物和服务都是他们所需要的。然而，向他们提供这些货物或服务，需要改变生产、运输货物的条件和方法。比如说，用小额贷款这种创新的方式为穷人提供信贷，这种做法是从西方世界之外的南美开始的，随后是南亚。³³同样，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非常有效，还可以激励其他国家继续创新。

与创造新产品或生产科技面临的风险不同，国际发展商机面临的风险是已知的、可处理的，例如交通和语言障碍等。老牌跨国公司导致的竞争非常有限，因为它们的重点市场在西方国家。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下去了。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要求跨国公司在国际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洛基（Lodge）教授建议美国成立一家世界公司来汇集风险，克雷格·威尔逊和彼得·威尔逊在 *Make Poverty Business* 一书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³⁴

不过，从穷人身上赚取利润引发了依附论问题以及核心对边缘的剥削问题。西方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因此被贴上了剥削的标签。我们不能全盘反駁这种说法：虽然这些公司获得了高利润，但他们也带来了发展的好处。“中国”的跨国公司不应该受到剥削的指责，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公司处于边缘位置。的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跨国公司更易被接受。另外，学者们也不能利用依附论去反对一个位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见第五章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讨论和引用的观点）。

另外，中国从历史先例和经济学中得到启发，鼓励其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发展创造的机遇。埃里克·R·伍尔夫指出，历史上各国都积极引导他们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正如本章之前所说：“……国家通常需要协助和补贴新生产业，保护它们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或帮助它们开辟国外新市场”。³⁵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销售附加值更高的商品或奢侈品能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也是国家和公司的明确目的。不过，历史上并非都是如此。英国在香料贸易（从马来群岛到欧洲）控制权之争中输给了荷兰，但最终因为棉花贸易（从南亚到欧洲）的巨大市场而变得更强大。³⁶当今的霸权美国则是依靠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变得强大。美国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工作岗位和工资收入，因此带来了消费者和商业利润。大规模生产、生存必需品和服务都有稳定的需求曲线。与特定市场或奢侈品相比，这些商品的价格曲线非常稳定。

对中国和“中国的”的跨国公司来说，与向人口不断降低的西方国家出售飞机或汽车相比，向 40 亿消费者销售基本的发展货物或服务，如食物、住房、水和卫生，是更明智的选择。³⁷最后，历史上的先例表明，从长期来看，国家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政治利益和服务而推动的宏观变化，能为国家变得更强大，他们为人们提供帮助，因此获得支持，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³⁸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为很多人提供了政治和公共利益。与发达大国相比，中国在利用国际发展机会上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宏观变化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面临许多困难的障碍。然而中国也并非没有竞争。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的其他国家也有潜力加入其中。在国际政治经济

体系中，印度和巴西也能提供国家领导力，因此他们是替代中国的有力竞争者。联合国预计，印度人口将在 2050 年超过中国。³⁹另外，印度是民主国家、英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与西方国家有相融之处。印度极度多样化的政体运转良好，可以算得上是微型的全球化的模板。但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目前是发达大国和金砖四国中最好的。

推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宏观变化可以获得力量，这方面有以下三个影响原则：民主、自主决定权和人权。民主和发展之间有三种理论：一、经济发展带来民主；二、民主对发展至关重要；三、发展与民主没有关系。学者收集数据在理论上对这三种论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⁴⁰

第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创造剩余财富和时间。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并开始关注生活质量。这种自主决定的意愿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将民主理论应用于实践能使人们最广泛参与的国家管理。

第二种理论认为，发展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实现，个体以外因素推动的发展无法推动个人实现。民主重视个体，因此是最佳的政治组织形式。其他制度缺乏个体实现，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威胁发展和可持续性。所以民主是发展不可或缺。没有民主，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将面临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是纯理论概念，实际中不存在民主。国家只有在政治分裂或经济衰退时才会遇到国家治理的问题。治国方略的质量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个体和国家来说，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只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然而，大国、各个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

公司的意识形态对发展是有影响的：他们如果认为民主是最好的体制，就会为民主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民主国家的发展结果要比采用其他体制的国家更好。

这三种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民主是政治利益，但只是众多政治利益中的一种。毕竟民主的成本是十分昂贵的，一次选举就要花掉数百万资金。⁴¹对还未实现高度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与其将有限的国家资源用在创造民主上，不如用在其他的政治和公共利益上。教育、医疗保健和民主相比哪一个更好？中国在 2009 年承认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明确表示改革需要按照中国共产党（CCP）制定的步骤进行。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承认了中国需要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华社这样报道：“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民主在人类创造并采用的政治体制中‘缺陷最少’。”⁴²

从国际发展角度来看，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是一个发展国家，可以说这比实行民主治理更加重要。这个发展国家有“足够好的治理”，其中心组成部分是致力于发展的、强有力的、稳定的国家，在实践中奉行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政策。中国必须提供与全球国家-市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相符的政治和公共利益

对中国，以及作为一个促进国际发展的温和霸权，她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能力，面临自主决定权和人权两个最大问题。在国家-市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无法长期否认自主决定和忽略人权。自主决定是国际发展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国家没有失去自主决定权的条件下，个人身份获得认可和个人优先发展项这二者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然而在或输或赢的重商主义背景下考虑发展，就常常会导致他人失去自主决定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力量关系要

求发展必须是真正的国际发展。因此，中国需要对西藏人民、维族人民和台湾人民的意愿做出回应。

人权通常是与国家力量相互排斥的。或输或赢的重商主义，个人与国家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立，这两种情况存在相似之处。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国需要更多的把人民当成个体，或至少从文化上当成家庭来对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三个原则：民主、自主决定和人权——是中国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力量的障碍，但这些障碍并非是不被承认或不可逾越的。中国现在面临哪些国际发展机遇？

国际发展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的机会

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引领全球变化。历史上中国在本区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15世纪时中国是最先进的政治经济体，控制着亚洲各国的贸易。例如，明朝皇帝朱棣支持马六甲的 Sri Parameswara 国王和他的后代，保护 Sri Parameswara 国王建立的独立王国免受统治东南亚的伊斯兰暹罗国的主宰；通过与印度的转运贸易，中国还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⁴³从科技方面来看，中华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中国现在也有能力再度做出贡献。

当前维护全球市场的任务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近在眼前的机遇：不论是从 20 国集团还是 2 国集团（美国和中国）角度来看，在经历过 2008 到 2009 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认为中国的行为是温和友好的。中国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发展国家，中国市场巨大、经济高产、储蓄率高——这是整个世界现在所缺乏的。不过牛津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全球经济治理项目主管奈瑞·伍兹在评价 2008 到 2009 年金融危机时，强调了大国领导力和政府间组织改

革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中国缺乏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全球角色的承诺：

20 国集团提出了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管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的计划，促进该组织与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共同确保有效的监管。但他们却没有出台为该措施提供资金的计划。⁴⁴

伍兹教授继续评论：

相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进行改革，导致这些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开始积累外汇储备作为“自用保险”或保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独立”，更多的国家从其他地方寻找资源。在东亚危机之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收入大幅下滑，预计到 2010 年每年的资金缺口达 4000 亿美元。这个曾经强大的机构不得不解雇了 300 到 400 名员工（员工总数为 2600 人）。要想说服疏远该组织的国家重新回来——并扭转用作自保的外汇储备积累——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行深度的改革。⁴⁵

中国拥有大国的资源，因此有潜在的能力对全球市场进行改革和重建，为所有国家带来益处。尽管中国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此举附带的帮助其他国家的效果可以看成政治和公共利益，并有拟态全球公共利益的效果。伍兹教授以及各个政府间组织也都认为，最为回应其他国家必须在世界秩序中接纳中国的结构力量。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机会来自碳能源造成的全球环境威胁。始于英国中部的工业革命的动因之一是为了克服木柴短缺

问题。⁴⁶今天，“石油峰值理论”和工业污染成为了令人担忧的全球威胁——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资源稀缺常常会促进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大国，有采取应对措施的独特优势。。如果有机会影响和重建全球市场，向环境上可持续资本主义转型，发展中的大国需要实施国家调控。同时在科技模式上，要从使用石油和煤炭转到核能（裂变和聚变）和电能。无碳能源在技术上是是可以实现的，但其成功实施还需要合理的政治经济领导力。

没有发展国家指导的全球市场会在现有的模式下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个市场现在仍然可以获取利润。只有经过发展国家的调控，新的模式才会出现，因为转型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其他损失还包括产品研发阶段的资金投入，以及已经投入和盈利的资金的损失。只有大国才能重塑全球市场。欧盟国家和美国的发达水平，归功于用旧科技模式赚取利润的跨国公司。中国采用了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可以引领世界走向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一种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以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形式来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是有先例的。在2009年中国外交学院东亚安全座谈会上，中国军方、政府和学术界高层自豪、明确的提出了这一论点。他们列举了以下这些例子：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对联合国贡献最多的国家；中国海军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反海盗（保证海洋航线安全）任务；中国向阿富汗提供资金援助，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帮助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我个人的观点也被普遍接受，即中国的潜力只发挥了十分有限的一部分。霸权的定义存在问题，这是座谈会的结论之一。

霸权与国际发展

中国要发挥更大作用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霸权的理解。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人们把欧洲人叫做“鬼佬”（西方通常翻译为‘Foreign Devil’）。例如，中国的一份核心文件《21 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哲学：中国的和平发展》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威胁”。⁴⁷一些基本假设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 20 世纪西方对国家-市场关系的描述。同样，在 21 世纪，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的背景也会影响对霸权的定义。这限制了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和推动国际发展。中国需要克服这种局限，因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中国通过意愿和能力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公共利益，以及拟态全球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

中国和西方（以及全世界）在知识领域的接触能够克服对霸权的消极解读和错误沟通。追求国际发展有助于这种普遍的、21 世纪的接触。在应用到国际发展辩证法时，它对霸权产生了相同的作用，与之前讨论的对超级大国定义的影响类似。这些定义和概念逐渐最先由金德伯格提出，后来基欧汉又对其继续发展（已在第二章讨论），并且与马克思修正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由意见观十分类似。⁴⁸在国际发展中，霸权指的是提供政治和公共利益以及拟态全球公共利益的国家。其他较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意见和信念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利益与霸权的喜好是相同的—或至少部分通过这一点来实现。

西方学者的基本争论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这个观点与金德伯格提出的霸权稳定论是相反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

21 世纪，国家-市场关系是发展的必需条件。另外，宏观变化不仅是由国家，也是由他行为体以及环境/背景推动的。这种观点从几个方面重塑了霸权稳定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霸权无需制定规章制度，而是需要提供以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形式出现的政治和公共利益。霸权不会控制物质资源，而是通过全球市场促进它们的使用。霸权不需要控制原材料、资本或市场，而是通过高价值的货物和服务而获得竞争优势，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国际发展的目的。霸权不需要刻意促成这方面的合作，而是巩固这种合作。没有霸权，各种机制也将继续存在，但通过有意识的宏观变化，这些机制可以得到改善。⁴⁹

中国发展模式 and 全球观念

中国发展模式为什么要包括国际发展并提供以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形式出现的政治和公共利益？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中国已经创造出很多概念，这些概念都可以作为对本章观点的补充，包括和谐世界、新的安全观和以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外交。中国已经发布了许多文件，从哲学上为这些观点提供支持，比如已经提到的《21 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哲学：中国的和平发展》。⁵⁰没有国际发展，中国将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因为她的发展必将导致与其他寻求发展的国家在资源上发生冲突（见第五章对石油的讨论）。缓慢的宏观变化，甚至中国获得推动宏观变化的资源，都常常被视为额外的威胁。

军事能力和安全问题能够说明这种威胁。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反海盗任务时，许多人对这一负责任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另一些人，比如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就提出了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中国派出军队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一直抱有的疑问：“中国没有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为什么还要大幅提升军力？”或者更直接一些：“美国海军已经为全球的海洋提供了保护，为什么中国还要打造蓝水海军？”⁵¹

十分了解中国的政治家在理解中国的意图时也会遇到问题。2007年，澳大利亚第一次选出了一位能说流利汉语的总理陆克文。这位前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1981到1988年，他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工作，并担任驻北京大使馆的一秘。⁵²北京对陆克文当选总理感到放松并抱有期望，认为中国找到了一个同情并了解中国历史、思维和发展挑战的西方朋友。然而在2008年，陆克文政府宣布制定国防白皮书，并在2009年发布。白皮书宣布扩充澳大利亚的海军力量，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力扩充，而当时世界还处在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白皮书中有以下内容：

4.26 中国也将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将越来越多的体现在发展投放军力的能力方面。体现中国地位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发展与其大小相适应的全球军事能力。但是如果中国对此没有详细解释，如果中国没有就其军事计划增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那么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速度、范围和结构将可能引起其邻国的忧虑。

4.27 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展开行动，但仍不足够。如果中国未能给予解释，那么本地区国家可能对中国军队发展计划的长期战略目的产生疑问，尤

其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应对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需要。⁵³

人们普遍认为这份白皮书说明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最大威胁，说明中国威胁到了美国对太平洋地区主导。⁵⁴如果中国可以将国际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其发展军力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会被认为是有益的。中国投放军力是为了保护海洋航线安全或应对自然灾害，这属于全球公共利益，这比发展军力入侵台湾要好得多。

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有许多积极和非凡的因素，可以在全球范围作为政治和公共利益以及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加以提倡。这些因素包括：安全、范围、发展成果、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认识到人口增长是发展的障碍、建立环境上可持续的城市、稳定的“足够好的治理”、以及欧洲中心之外的视角（其他章节已经指出）。但是除非中国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有能力、有意愿通过政治和公共利益以及拟态全球公共利益来使用自己的力量，否则她将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持反对观点。

结论

本章通过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下中国发展模式、国际发展和霸权的探讨，继续了 200 多年之前由政治经济学开创的对国家财富来源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为解决本世纪的最大挑战——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章指出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面对的普遍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这些障碍过分强调了国家—市场关系的潜在冲突，低估了这个关系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本章还指出，中国学术界对霸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上的理解，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阻碍了对中国更深入

的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些结论对本章的观点十分重要，也提供了在将来进行更广泛研究的途径。

本章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融入全球。对于所有国家来说，在当前的环境下更深入的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全球化促使国家-市场关系转变成多国家-市场关系。这个关系目前是促进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中国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各国都期望中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协助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这个维护过程是通过宏观变化实现的，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四个主要的行为体完成，即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中国若要对这个体系产生影响，就需要通过上述四类行为体发展推动宏观变化的能力。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应该在促进国际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既是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她有着独特的有利条件去应对本世纪最严重的问题、利用本世纪最大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指导下的市场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可以作为发展的范例，挑战由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发达的大国由于自身发展水平而不具备这种能力。另外，核心-边缘剥削理论使西方跨国公司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已在依附论章节进行讨论）。

因此，现在只能由中国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以拟态全球公共利益形式出现的政治和公共利益，推动宏观变化，促进国际发展。然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规则和价值—民主、自主决定和人权—阻碍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了这些障碍以及改革的必要性。在不远的将来，中国面临着两个机遇—全球市场的维护和环境上可持续的资本主义。通过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提供

乔纳森·H·平

拟态全球公共利益，中国可以促进自己的发展。中国如果有意愿使用自己潜在力量，也将促进国际发展。中国将成为通过国际发展角度重新定义的一个温和友好的霸权。

注释

¹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p. 25. Structural Power is ‘The power to decide how things shall be done, the power to shape frameworks within which states relate to each other, relate to people or relate to corporate entities.’

² Payne and Phillips, *Development*, pp. 152–158.

³ 见 Blazevic 撰写的第五章, ‘*Oil, Sea lanes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⁴ O’Brien and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1–39.

⁵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⁶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⁷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⁸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pp. 62–78.

⁹ 由外交学院学者提出

¹⁰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Inter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¹¹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gov.cn/english/>

¹² Phillips, ‘Whither IPE?’, pp. 246–69. Delliios 撰写的第二章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第二章讨论了西方建立的当代国际关系，指出中国哲学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涵。

¹³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
- ¹⁴ Philpott, 'Sovereignty', pp. 352–68.
- ¹⁵ Schwartz, *States Versus Markets*, pp. 11–41.
- ¹⁶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p. 265–6.
- ¹⁷ Payn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Unequal Development*; L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 ¹⁸ 结构上相互依存指由国际政治经济中基本、稳定和持久的关系给行为体造成的限制和机会；这导致发生在某个地方的事件会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
- ¹⁹ Cox,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85–123.
- ²⁰ Payn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Unequal Development*, p. 234.
- ²¹ Ping, *Middle Power Statecraft*.
- ²² Ping, *Middle Power Statecraft*, p. 226.
- ²³ Auer and Watanabe,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Davidann, *Cultural Diplomacy in U.S.–Japanese Relations, 1919–1941*.
- ²⁴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 31–46.
- ²⁵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²⁶ 可参考 Frangos, 'China flexes its financial muscle', p. 22; Human Rights First, 'China's Arms Sales to Sudan'; Maslen, 'In the Wake of the Boom', pp. 24–7; Worldwatch Institute, 'The China Factor'.
- ²⁷ Payne and Phillips, *Development*, p. 157.
- ²⁸ Pape, *Dying to Win*.
- ²⁹ Payn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Unequal Development*, p. 234.

-
- ³⁰ Grameen Bank, ‘About Us’.
- ³¹ Kaul, Grunberg and Stern, *Global Public Goods*.
- ³² Rotberg, *When States Fail*; Rotberg, *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
- ³³ Develtere and Huybrechts,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e Poor in Bangladesh’.
- ³⁴ Lodge and Wilson, *A Corporate Solution to Global Poverty*; Wilson and Wilson, *Make Poverty Business*.
- ³⁵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p. 266.
- ³⁶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 ³⁷ Bloom, Canning and Sevilla,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Linking Populatio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 ³⁸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 ³⁹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 ⁴⁰ 可参考 Decker and Lim, ‘What Fundamentally Drives Growth?’; Gradstein and Milanovic, ‘Does Liberte = Egalite?’; Grugel,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ealm of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Hope, ‘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Good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Hyden and Court,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glehart and Welzel, ‘How Development Leads to Democracy’; Mushkat and Mushkat, ‘Economic Growth,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China’s Future’; Smith, *Goo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
- ⁴¹ 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 ‘Costs of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1901–Present’.
- ⁴² Xinhua, ‘China Will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Actively Yet Prudently’; Vollmer and Ziegl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
- ⁴³ Rya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a*; Ping, *Middle Power Statecraft*, p. 148;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1300*.
- ⁴⁴ Woods, ‘Global Crisis’, p. 5.
- ⁴⁵ Ibid
- ⁴⁶ Perlin, ‘Peak Wood Forge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 ⁴⁷ Binjie, *China in Peaceful Development*, pp. 21-22.
- ⁴⁸ Bellamy and Schecter,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 ⁴⁹ Keohane, *After Hegemony*;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 ⁵⁰ Binjie, *China in Peaceful Development*.
- ⁵¹ Barrowclough, ‘China Sends Navy to Fight Somali Pirates’.
- ⁵² Macklin, *Kevin Rudd*; Stuart, *Kevin Rudd*.
- ⁵³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p. 34.
- ⁵⁴ Sainsbury and Stewart, ‘China a “Peaceful Force” in Beijing’s Response to Defence Paper’.

参考书目

- Auer, James E. and Tsuneo Watanabe,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Who was Responsible?*, Yomiuri Shimbun, Tokyo, 2006.
- 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 'Costs of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1901–Present, 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 2010', *Australian Electoral History*,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aec.gov.au/Elections/Australian_Electoral_History/Cost_of_Election_1901_Present.htm
- Barrowclough, Anne, 'China Sends Navy to Fight Somali Pirates', *Timesonline*, 26 December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frica/article5398856.ece>
- Bellamy, Richard Paul and Darrow Schecter, *Gramsci and the Italian Stat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1993.
- Binjie, Liu, *China in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hilosophy o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2006.
- 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Santa Monica, 2003.
- Bradsher, Keith, 'Green Power Takes Root in the Chinese Desert', *The New York Times*, 3 July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9/07/03/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03renew.html>
- Breslin, Shaun, 'Northeast Asia', in A. Payne (ed), *The New Region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4, pp. 89–117.

-
- Clark, Gregory,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7.
- Cohen, Benjamin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9.
- Cox, Robert W.,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 Davidann, Jon Thares, *Cultural Diplomacy in U.S.–Japanese Relations, 1919–1941*,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7.
- Decker, Jessica Hensen and Jamus Jerome Lim, ‘What Fundamentally Drives Growth?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Deb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0, no. 5, 2008, pp. 698–725.
- Develtere, Patrick and An Huybrechts,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on the Poor in Bangladesh’,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30, no. 2, April–June 2005, pp. 165–89.
- Frangos, Alex, ‘China flexes its financial muscle’, *The Australian*, 4 May 2010, p. 22.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enguin, London, 1992.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 Galula, David,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1964.
- Gradstein, M. and B. Milanovic, ‘Does Liberte = Egalite? A Survey of the empirical links between Democracy and Inequality with some Evidence on the Transition

-
-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 18, no. 4, 2004, pp. 515–37.
- Grameen Bank, 'About Us',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grameen-info.org/index.php?Itemid=164&task=blogsection&option=com_content&id=5
- Greig, Alastair, *Challenging Global Inequalit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6.
- Grugel, Je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ealm of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N. Phillips (e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5, pp. 193-220.
- Hope, Kempe Ronald, '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Good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Lessons from the Field',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9, no. 1, February 2009, pp. 79-86.
- Human Rights First, 'China's Arms Sales to Sudan', *Human Rights First*,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wp-content/uploads/pdf/080311-cah-arms-sales-fact-sheet.pdf>
- Hunt, Diana, *Ec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Competing Paradigms*, Harvester Wheatsheaf, Sydney, 1989.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s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91.
- Hyden, Goran and Julius Court,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1*, 20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odi.org.uk/projects/00-07-world-governance-assessment/Docs/WGS-discussionPaper1.pdf>

-
-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How Development Leads to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9, pp. 33–48.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ata and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fstatistics.org/imf/>
- Kaul, I., I. Grunberg and M.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9.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Fontana Press, London, 1988.
- Keohane, Robert Owen, *After Hegemony [electronic resource]: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84.
- Kiely, Ray,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Imperialism, Hegemony*,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7.
- Kilcullen, David,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9.
- Kindleberger, Charles,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3.
-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Dec 1994, pp. 62–78.
- Leys, Colin, 'The Crisis in 'Development Theor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96, pp. 41–58.
- Leys, Coli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96.

-
- Lodge, George and Craig Wilson, *A Corporate Solution to Global Poverty: How Multinationals Can Help the Poor and Invigorate Their Own Legiti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6.
- Lynn, Stuart 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a Divided World*,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2003.
- Macklin, Robert, *Kevin Rudd: The Biography*, Penguin, Camberwell, 2007.
- Maslen, Geoffrey, 'In the Wake of the Boom', *About the House*, September 2006, pp. 24-7,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h.gov.au/house/news/magazine/ath28_wake.pdf
- Mushkat, Miron and Roda Mushkat, 'Economic Growth,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China's Future',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9, 2005, pp. 229-58.
- O'Brien, Robert and Marc 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Evolution and Dynamics*,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7.
- Pape, Robert,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5.
- Paul, Joel R.,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4, no. 1, 2003, pp. 1-55.
- Payne, Anthony, *The Global Politics of Unequal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5.
- Payne, Anthony (ed), *The New Region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4.
- Payne, Anthony and Nicola Phillips, *Development*,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10.
- Perlin, John, 'Peak Wood Forge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Miller-McCune*, 19 April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miller-mccune.com/science-environment/peak-wood-forges-an-industrial-revolution-14608/>

-
- Phillips, Nicola, 'Whither IPE?', in N. Phillips (ed), *Global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5, pp. 246–69.
- Philpott, Daniel, 'Sovereignty: An Introduction and Brief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2, Winter 1995, pp. 352–68.
- Ping, J. H., *Middle Power Statecraft: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Asia–Pacific*, Ashgate, London, 2005.
- Ricklefs, M. C.,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1300*, 2nd edn, MacMillan, London, 1993.
- Riddell, Roger, *Does Foreign Aid Really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7.
- Rist, Gilber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rev. edn, Zed Books, London, 2004.
-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1.
- Rotberg, Robert I. (ed), *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 A World Peace Foundation Book,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Washington D.C., 2003.
- Rotberg, Robert I. (ed), *When States Fai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4.
- Ryan, N. J.,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a*, Longman Malaysia, Kuala Lumpur, 1971.
- Sachs, Ignacy, 'Revisiting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8, no. 3, Fall 2009, pp. 5–21.
- Sainsbury, Michael and Cameron Stewart, 'China a "Peaceful Force" in Beijing's Response to Defence Paper', *The Australian*, 6 May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nation/china-a-peaceful-force/story-e6frg6nf-1225710310338>

-
- Schwartz, Herman M., *States Versus Markets: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2nd edn, Macmillan, Basingstoke, 2000.
- Smith, B. C., *Good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7.
- Stiglitz, Joseph, 'Redefin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What Should It Do? How Should It Do It? And How Should These Decisions Be Made?', Paper presented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MITI Research Institute, Tokyo, Japan, 17 March 1998, Retrieved from <http://go.worldbank.org/QBU4U4BVR0>
-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 Pinter, London, 1994.
-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 Stuart, Nick, *Kevin Rudd: An Unauthorised Political Biography*, Scribe, Carlton North, 2007.
- Thérien Jean-Philip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Grand Compromise?', *EcoLomic Policy and Law: Journal of Trade and Environment Studies*, Special Issue 2004–2005, Septemb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lomics-international.org/epal_2004_5_therien_towards_new_grand_compromise....pdf
- Tow, William T.,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1.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Inter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o-it-yourself Data Table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hdrstats.undp.org/en/tables/default.html>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

-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esa.un.org/unpd/wpp/unpp/panel_population.htm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Linking Population,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Rapid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fpa.org/pds/trends.htm>
- Vollmer, Sebastian and Maria Ziegl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 Does Democracy Fulfil its Constructive and Instrumental Role',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818, 10.1596/1813-9450-4818,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content/workingpaper/10.1596/1813-9450-4818>
- Wilson, Craig and Peter Wilson, *Make Poverty Business: Increase Profits and Reduce Risks by Engaging with the Poor*, Greenleaf Publishing, Sheffield, 2006.
- Wolf, Eric R.,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2.
- Woods, Ngaire, 'Global Crisis: Global Response?',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4, no. 6, 2009, pp. 2–7.
- Worldwatch Institute, 'The China Factor: Booming Economy Tests World's Vital Signs', *Worldwatch Institute*, 11 May 2005, Retrieved from <http://www.worldwatch.org/>
- Xinhua, 'China Will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Actively Yet Prudently', *China View*, 5 March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5/content_10945972_1.htm